

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论初探

赖思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本文借鉴翻译过程研究的最新成果, 系统地探讨了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论, 介绍了常用的三种主流方法和五种辅助方法, 包括其原理、优缺点和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以期对从事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翻译过程研究; 方法论; 键盘记录法; 眼动法; 多元互证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迄今为止, 翻译学作为一门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科, 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并有不少相关著述付梓出版, 如《路线图: 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翻译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aldanha & O'Brien, 2014)、《翻译方法论》(黄忠廉, 2009)、《翻译学方法论》(李惠红, 2010)、《翻译研究方法概论》(穆雷, 2011)。尽管如此, 缺乏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仍然是阻碍我国译学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 国内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尚不到位, 学术研究缺乏正确指导”(许钧、穆雷, 2009)。穆雷、邹兵(2014)在对国内近 700 篇博士论文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许多博士生在研究方法上缺乏严格的训练, 对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要求不理解, 不能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得到正确的答案, 后人也无法根据其表述重复其研究, 因此无法形成知识积累”, 并且建议“在博士培养环节应当加强研究方法论的训练”。确实,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对于研究者来说, 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质量。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对翻译学方法论丰富的研究成果, 结合不同学者的研究背景和学术专长, 从跨学科视野, 对各种翻译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整合, 力图避免其片面性, 体现翻译研究的整体性、丰富性和多样性。

2.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既想对翻译实证研究方法论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 厘清“方法”与“方法论”这两个极易混淆不清的概念是前提。《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方法”是“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为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 而“方法论”则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 是“在某一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这一释义与 Saldanha & O'Brien 的观点相契合, 两位学者认为“方法论是研究某一现象的总体途径, 而方法则是研究中的具体技能”(2014:13)。换言之, 方法论是方法的科学。因此, 方法论是一个理论层次的概念, 比方法更加抽象。

根据层次的不同, 方法论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世界、实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方法理论。一般科学方法论是研究各门具体学科, 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适用于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具体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 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 是对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化(李惠红, 2010:25-26)。依据此分类, 我们探讨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法论当属具体科学方法论。

实证性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最早源于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实证研究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通

过经验观察、收集数据和客观描述来论证某种观点、描述某种规律,从而达到研究目的。“翻译作为一门既包含艺术又包含科学特性的学科,有着人文的成分,也有着科学的因素,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人文思辨加科学分析的多重认识与探索”(姜秋霞、杨平,2005:23)。然而,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以理论思辨为主,忽视翻译的科学性,具有一定局限性。相较之下,实证研究方法则是现代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翻译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末就已出现,以1896年德国学者 Krings 进行的第一例翻译个案研究为开端,翻译实证研究目前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翻译研究的实证研究模式已逐渐形成。Chesterman (1988:20-330) 将21世纪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向概述为三点:“一是研究兴趣上的转变,从注重翻译本身扩展到注重译员及其决定;另一种是研究方式上的转变,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还有一种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哲学的概念分析转向验证式的研究。”在翻译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是翻译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使得研究那些制约和影响翻译产品、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功能的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可能,并增强了研究的可预测性和可复制性。翻译研究的实证转向树立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方法,加强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确定了翻译研究的描写性和跨学科性的学科性质。

3.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法

根据 Holmes (1988) 提出的翻译研究理论框架,翻译过程研究隶属于描述性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译者在执行翻译任务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即探究译者大脑中的“黑匣子”。由于译者大脑中的认知心理过程无法被直接观察,因而翻译过程研究多借助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来间接观察和探究这一神秘的“黑匣子”。经过近30年的发展,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已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前沿性研究。方法论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研究的基础。因此,本文将系统归纳当前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有声思维法(TAPs)为主的内省法(Retrospection)、键盘记录法(Key-logging)、眼动法(Eye-tracking)和其它辅助方法。

3.1 有声思维法

有声思维法原是一种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收集数据的常用方法,其概念最早见于 Ericsson & Simon (1984) 对口述报告(verbal report)的分类。Ericsson & Simon (1984) 根据受试口述报告的时间与执行实验任务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将口述报告分为共时(concurrent)口述报告和事后(retrospective)口述报告。前者指受试在进行实验任务的同时讲述自己大脑中的心理认知过程,后者指受试在完成实验任务之后追述自己的心理认知过程。根据 Ericsson & Simon (1984) 的观点,有声思维法即受试者在完成实验任务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尽可能地说出大脑中的思考内容。研究者用录像机或录音机记录受试在实验过程中说的每一句话,数据收集完成后,将有声思维汇报内容转录为可用于进一步分析的书面文本。有声思维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之中,目前,翻译学界公认的第一部 TAPs 翻译研究著作是 Ursula Sandrock 于1982年撰写的博士论文,题为“Thinking-aloud Protocols”(TAPs)(李德超,2005:30)。但由于该论文由德语写成,并且未正式出版,故而在翻译学界影响甚微。直至1986年,House 等人出版的论文集中出现了一系列运用 TAPs 研究翻译过程的论文,自此学界才开始对 TAPs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尽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TAPs 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中,但仍不乏学者对其信度和效度持怀疑态度。诚然,TAPs 能收集受试头脑中认知思维过程的内部数据,但其自身仍具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操作层面和方法论层面(李德超,2004:386)。具体来说,TAPs 翻译研究在具体的实验操作上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够规范,研究者往往忽视了对实验结果可能造成影响的无关变量的控制,如实验环境、实验时间和其它外部干扰因素。此外,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运用 TAPs 的翻译过程研究受试人数普遍较少,根据刘润清(1999:146)的观点,“30是样本的最小极限,因为少于30,必须进行技术处理才能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少于30,收集的数据不能形成正态分布”。从目前已有的研究

来看, TAPs 翻译研究的样本量少有达到这一标准, 故而其研究信度必定大打折扣。

在方法论层面上, TAPs 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质疑: 一是其究竟能否真实全面地反映受试的认知心理过程; 二是其是否会对翻译过程造成干扰影响。回答 TAPs 究竟能否真正反映受试的认知心理过程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思维过程。若将思维过程定义为是神经系统的活动, 那么, 包括 TAPs 在内的所有口述报告都无法直接反映思维过程; 若按 Ericsson & Simon (1984) 的观点, 将思维过程定义为一种信息加工过程, 而信息处理部分主要又发生于大脑的工作记忆中, 那么 TAPs 则能反映思维过程, 因为储存在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能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Jääskeläinen, 1998:266-267)。另一个在 TAPs 翻译研究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 TAPs 是否会对大脑内部的思维过程造成干扰? 是否会打断受试的翻译思路、拖慢翻译速度? Ericsson & Simon (1984) 在进行大量的实验调查后认为, TAPs 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任务时间, 但不会影响认知过程的顺序和结构。尽管此类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人们对于 TAPs 运用于翻译实证研究的疑虑, 但 TAPs 自身的局限性仍不容忽视。

为尽量克服因 TAPs 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的研究信度和效度问题, 研究者在进行实验设计时应精心考量, 思虑周全。具体来说, 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尽可能使 TAPs 的操作规范化、严谨化, 考虑到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的种种无关变量 (包括实验环境、条件、时间、地点等), 并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 二是在实验前对受试进行培训, 包括技术培训和心理培训, 此时应注意培训材料不能与测试材料相同或相近; 三是为防止受试在测试期间出现长时间的沉默 (累计沉默时间一般不得超过总测试时间的 10%), 研究者宜事先设计某些特定的提醒方法, 常见的提醒方法有声音提醒和灯光提醒; 四是在对有声思维录音或录像进行转写时应该遵循完整、忠实、可靠三原则; 五是在分析有声思维数据时应将其分为“自我描述”、“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三类, 并将内省式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而“自我描述”数据只起到补充说明翻译认知过程的作用 (李德超, 2004)。

3.2 键盘记录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们将内省法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中以来,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逐渐揭开了译者大脑中“黑匣子”的神秘面纱。但由于内省法自身具有的局限性, “翻译过程研究主要关注‘问题解决’ (problem-solving) 和‘决策制定’” (decision making) (冯佳、王克非, 2016:13), 大致廓清了“翻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Jääskeläinen, 2002: 109)。但这些研究结果主要基于受试的主观陈述和研究者的臆断推论, 缺乏更加客观有力的数据支撑, 因此键盘记录技术应运而生。

键盘记录软件是一种能实时记录键入 (insertions)、删除 (deletions)、停顿 (pauses)、修改 (revisions)、复制粘贴 (cut and paste operations)、鼠标活动 (mouse movement) 等所有键盘活动的特殊软件程序。此类软件在电脑后台执行任务, 基本不会对实验过程造成干扰, 故不会减慢受试的翻译速度, 亦不会增加其认知负荷。目前, 在翻译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键盘记录软件是由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 Arnt Lykke Jakobsen 和 Lasse Schou 两位学者开发的 Translog (Jakobsen & Schou, 1999)。从 1995 年问世至今, Translog 已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 最新的 TranslogII 在全方位记录键盘活动的同时, 还能为所有的键盘活动打上精确的时间标签。简单来说, Translog 可以完整记录从初稿起草到译文修订的全过程。Translog 收集的受试翻译过程行为数据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前者包括总任务时间及翻译各阶段所耗时间, 后者包括停顿时长、停顿频次、停顿位置、译文产出单位数量和长度、修订次数和时长等 (Saldanha & O'Brien, 2014:133)。键盘记录工具用定量的“硬数据”实现了对内省法的补充, 使翻译过程研究得到了更加客观细致的探究,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也更加具体明晰, 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键盘记录工具为翻译过程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但其自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 由于键盘记录工具仅限于收集受试在译文产出过程中的行为数据, 缺少受试在原文阅读和理解阶段的行为数据, 也未能收集受试在整个翻

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数据,因此研究者一般需要运用至少一种其他的数据收集工具,如口述报告或眼动追踪,采用多元互证模式(Triangulation),利用多种数据交叉验证,才能弥补单方面数据的偏差和不足,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解释翻译认知过程。其二,Translog只能记录其工作界面的键盘活动,无法记录受试的外部资源搜索情况,因此研究者宜将Translog结合屏幕录制软件一同使用。其三,受试的打字技能是严重影响实验结果的无关变量,故而研究者在实验前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受试的打字水平基本处于相近水平。其四,由于Translog的工作界面不具有拼写检查功能,且其格式化特征不可随意调整,造成实验中的翻译环境与受试日常翻译环境相差较大,影响实验效率,因此建议研究者在实验前对受试进行热身前测,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实验环境。

3.3 眼动法

眼动法在国外心理学研究中已有百余年历史,被广泛运用于交通、医学、教育、阅读等领域。尽管在其他领域已有较成熟的运用,但直至2006年,眼动法才开始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中。O'Brien(2006)利用眼动法探究译者使用翻译记忆库认知工具时的认知负荷。该研究是将眼动法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第一次大胆尝试,且肯定了眼动法是探究翻译过程研究的有效方法。此外,开始于2006年的欧盟项目Eye-to-IT也是将眼动法运用于翻译研究的较早尝试,至今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眼动仪利用角膜和瞳孔反射法原理,以毫秒为单位记录眼球注视屏幕的精确位置和眼球运动轨迹。眼动法能记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每一时刻的信息加工情况,获得一系列的眼动指标,包括总任务时长(total task time)、凝视时间(gaze time)、平均注视时长(average fixation time)、注视次数(fixation count)、注视频率(fixation frequency)、眨眼频率(blink frequency)、瞳孔直径变化(pupil dilation)等,其中最常用于分析翻译认知过程的眼动指标有凝视时间、平均注视时长、平均注视次数和瞳孔直径。

眼动法与翻译过程研究结合的主要理论基石是“即时加工假说”(Immediacy Assumption)和“眼-脑假说”(Eye-Mind Assumption)。“即时加工假说”认为“对文章中实词的加工和理解从受试看到这个词就即时开始”(Just & Carpenter, 1980:330)。“眼-脑假说”认为,“受试对一个词的注视会一直持续到它的心理加工完成为止”(同上)。简言之,受试对某词的注视与对该词的心理加工同时进行,受试所加工的词正是其所注视的词(闫国利、白学军, 2012)。因此,受试的眼球注视位置和眼球运动轨迹可以反映其内在的心理认知过程。研究者通过收集受试在翻译过程中的眼动数据,能够获悉其在任意时刻的视觉注意力焦点,从而更系统地反应译者大脑中“黑匣子”的运作情况。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眼动仪根据外形结构的差异可分为以下四类:头戴式(head-supported)、头盔式(head-mounted)、遥测式(remote)和眼镜式(eye glasses)。不同类型的眼动仪在测量精度和生态效度上都具有不同的特征,研究者应根据自身研究问题选择最为适宜的一款眼动仪。

眼动法相较于其他传统的行为数据收集方法而言具有生态效度高、数据丰富精确的优点,但眼动法也仍具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眼动仪设备购置费用较高,且研究者需要接受特定软硬件培训,这将耗费较多人力和物力;第二,由于人的瞳孔极其敏感,实验环境和受试生理心理状况都将对其产生较大影响,故而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对此类无关变量的控制,最好确保所有受试都在统一的实验室内完成实验任务;第三,眼动法收集数据十分庞大,数据分析过程非常繁复耗时,因此建议研究者选择的实验文本不宜过长,以适当减轻后期数据分析的负担;第四,为尽量确保眼动数据的精度,实验文本呈现的字体大小(14-16号字)、行间距(两倍行距)和页边距都要符合特定要求,且为了避免翻页,实验文本也宜选用短文本。

3.4 其他辅助方法

除以上介绍的三种主流方法之外,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还运用了多种辅助方法,包括现场观察法、屏幕录制法、问卷法、访谈法和生理测量法等。目前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基本都已

采用多元互证模式，运用多种数据相互验证，弥补单一数据的不足，从而加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说服力。

3.4.1 现场观察法

现场观察法是指研究者全程观察受试的翻译过程，并记录下其所有行为活动，包括朗读原文或译文、思考、停顿、查找外部资源、生理心理状态等。现场观察法的优点在于能实时记录下受试的一举一动，为揭示受试翻译认知过程提供重要的补充数据，而缺点则在于其对翻译过程会造成一定的干扰，增加受试的心理压力，影响其正常发挥，从而削减实验的生态效度。因此，研究者可退居受试后方或在另外的房间中通过监控视频观察受试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实验过程的干扰。

3.4.2 屏幕记录法

屏幕记录法指运用专门的屏幕录制软件记录受试在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屏幕活动，并生成可回放的视频文件。研究者可通过回放屏幕记录视屏，帮助受试进行回溯性有声思维报告，且可从中发现受试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研究中，最常运用得屏幕记录软件有 BB Flashback、Camtasia、Video Specialist 等。屏幕记录和键盘记录两种数据收集工具均记录受试在翻译过程中的计算机活动，两组数据相互补充，可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认知过程。

3.4.3 问卷法

问卷法也是翻译过程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的优点在于能够省时省事地收集大量结构化数据，而缺点则在于问卷的设计极易出错，容易出现社会期望效应和印象操纵效应，且不适用于收集解释性数据。为了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研究者应在正式调查之前对问卷进行前测 (Pilot study)。在数据收集阶段，要特别注意取样方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同时还要注意问卷的回收率。在翻译过程研究中，问卷往往分为测前问卷和测后问卷，前者用于收集包括受试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语言水平、翻译从业年限等在内的个人背景信息，后者则用于收集与具体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如翻译问题、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等。此类数据具有一定的内省数据性质 (王少爽, 2012:459)。

3.4.4 访谈法

访谈法是获取翻译过程解释性数据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研究者在翻译任务结束后，依据已收集的翻译过程行为数据，针对具体研究问题对受试进行提问，收集的数据属于翻译认知心理数据，可用于解释说明受试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访谈的优点也正在于其能深入挖掘受试在翻译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而其缺点则在于时间成本高，受试数量小，研究结论不可推论。访谈分为结构化访谈、非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结构化访谈采用标准的程序进行高控制性访谈，主要关注事实类信息。而非结构化访谈倾向于自由式对话，以共同探讨研究问题，适合探索性研究。究竟选择哪种类型的访谈取决于研究问题。

3.4.5 生理测量法

目前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生理测量法主要有脑电图 (EEG) 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尽管将生理测量法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想法早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萌生，目前欧盟的 Eye-to-IT 项目是真正将脑电技术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首次尝试 (Saldanha & O'Brien, 2014:148)。脑电研究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均属于神经科学，其优势在于能直接观察大脑活动，而最大的缺点则在于其昂贵的成本。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确实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还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4. 多元互证模式 (Triangulation)

在翻译实证研究经历了 30 余年的发展之后，多元互证模式成为一种翻译实证研究的新模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Triangulation 一词源于测绘学，中文译为“三角测量”，广泛运用于多个领域。如今，该方法被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指使用多种不同的数据刺激方法收集收据，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探索研究，以提高研究的信度。

Alves (2003) 在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一书中较早对多元互证模式做了总结分析。国内学者郑冰寒 (2008) 率先在《上海翻译》上发表过“翻译过程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一文, 对该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Guion 等人 (2011) 将多元互证模式划分为五类, 分别为数据多元互证 (Data Triangulation)、研究者多元互证 (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理论多元互证 (Theory Triangulation)、方法多元互证 (Data Triangulation) 和环境多元互证 (Environmental Triangulation)。

其中, 数据多元互证指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探究研究问题, 以增强研究信度。研究者多元互证指多名研究者参与研究过程, 每位研究者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对比各名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若各名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则可增加研究发现的信度。理论多元互证指从多个理论视角对同一数据进行分析, 通常的做法是请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同一数据进行解读, 若各名研究者的解读一致, 则表明研究的信度较高。方法多元互证即运用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展开研究, 对比研究结果是否相似。环境多元互证指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同一个问题展开研究。若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得的研究结果一致, 则说明研究的信度得以建立。

在目前的翻译实证研究中, 多元互证模式基本局限于方法多元互证和数据多元互证这两种类型。其实, 翻译实证研究不应仅局限于此, 也可以从多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同一数据进行解读, 即理论多元互证法; 可以汇集多个研究者对同一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 即研究者多元互证法; 还可以对同一位译者在不同环境下的翻译表现进行研究, 即环境多元互证法。多元互证法在翻译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待扩展, 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小结

本文论述了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常用的三种主流方法和五种辅助方法, 分别为有声思维法、键盘记录法、眼动追踪法、现场观察法、屏幕录制法、问卷法、访谈法和生理测量法。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 没有哪种方法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 因此研究者应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考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依据现实条件, 选用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在翻译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们往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获取有关翻译过程的内省数据和行为数据, 利用来源不同的各种不同类型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减少单方面数据的偏误和不足, 这就是近年来在翻译实证研究领域逐渐兴起的“多元互证模式”。随着研究工具的不断革新, 特别是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技术的引入, 翻译实证研究近年来快速发展, 丰硕的研究结果丰富了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 译者大脑“黑匣子”的神秘面纱正在被逐渐揭开。

参考文献

- [1] Alves F. 2003.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 Bartlomiejezyk M. 2015.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y Gabriela Saldanha [J]. *Interpreter & Translator Trainer*, 9(1):124-126.
- [3] Chesterman A. 1998. Causes, translations, effects [J]. *Target*, 10(2):201-230.
- [4] Ericsson K. A. & H. A. Simon 1993.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3(3).
- [5] Guion L A, D. C. Diehl & D. McDonald. 2013. Triangulation: Establishing the Validity of Qualitative Studies [EB/OL]. Available at: <http://edis.ifas.ufl.edu/pdffiles/FY/FY39400>.

- [6] Holmes, J. S. 1988.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Holmes, J. S. (translated).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Rodopi, 67-80.
- [7] House, J. 1986.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G. Narr.
- [8] Jääskeläinen, R. 1998. Think-aloud protocols [A]. In M. Baker(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9] Jääskeläinen, R. 2002.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J]. *Target*, (1): 107-136.
- [10] Jakobsen, A. L., & L. Schou. 1999. Translog documentation [A]. In Gyde Hansen (ed.).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Series 24).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51-186.
- [11] Just, M. A. & P. A. Carpenter. 1980. A theory of reading: from eye fixations to comprehens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4): 329-354.
- [12] O'Brien, S. 2008. Processing fuzzy matches in translation memory tools: an eye-tracking analysis [A]. In S. Göpferich, A. L. Jakobson and I. M. Mees (eds.). *Looking at Eyes: Eye-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Series 36) [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79-102.
- [13] Saldanha, G & S., O'Brien. 2014.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Routledge.
- [14] Williams, J. & A. Chesterman. 2002.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St. Jerome Publishing.
- [15] 冯佳, 王克非. 2016. 探悉翻译过程的新视窗: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J]. 中国翻译, (1): 12-18.
- [16] 黄忠廉. 2009.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7] 姜秋霞, 杨平. 2005. 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J]. 中国翻译, (1): 23-28.
- [18] 廖七一. 2001.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J]. 中国翻译, (5): 14-18.
- [19] 李德超. 2004. TAPs 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6(5): 385-391.
- [20] 李德超. 2005.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 (1): 29-34.
- [21] 李惠红. 2010. 翻译学方法论[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22] 刘润清. 2015.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3] 穆雷. 2011.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4] 许钧, 穆雷. 2009. 中国翻译学研究 30 年(1978 -2007)[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 77-87.
- [25] 王少爽. 2012. 西方学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体系[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5): 455-460.
- [26] 闫国利, 白学军. 2012. 眼动研究心理学导论[M].北京: 科学出版社.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Lai Si

(Hunan University, Hunan/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by introducing three mainstream research methods and five auxiliary methods, including their principl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points for attention.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young scholars engaged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Keywords: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 logging; eye-tracking; triangulation